

祁门红茶源流考

康健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从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上半叶,国际市场上红茶需求日趋旺盛,形成以红茶为主的贸易格局,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红茶产业的发展,红茶制造技术从福建武夷山地区不断北传到江西、湖南、湖北、安徽等地,最终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孕育出品质优异的祁门红茶。祁门红茶产区在地域上并非局限于祁门一县,而是涵盖祁门、建德和浮梁三县。祁门红茶的创制时间应该包括咸丰十一年前后的初期阶段、同治五年的第二阶段和光绪初年的最终定型三个阶段。晚清时期,作为高端红茶的祁门红茶从无到有,对外贸易发展迅速,逐渐成为国际市场上最有竞争力的畅销商品。

【关键词】全球视野;国际背景;祁门红茶;祁门红茶产区;早期贸易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4)03-0080-17

Origin and Flow of Qimen Black Tea

KANG Jian

(History Colleg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Abstract: From the mid-18th to the first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demand for black tea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gradually grew. This formed a trade pattern dominated by black tea, it great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lack tea industry in China. The manufacturing techniques of black tea continuously spread from the Wuyi Mountain area in Fujian province to northern regions such as Jiangxi, Hunan, Hubei, Anhui and others. Qimen black tea with excellent quality was finally bred in the 1860s and 1870s. The producing area of Qimen black tea is not limited to one county, but covers three counties, namely Qimen, Jiande and Fuliang. The creation time of Qimen black tea should include three stages: the initial stage around the 11th year of Xianfeng era, the second stage in the 5th year of Tongzhi era and the final stage in the early year of Guangxu er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Qimen black tea, as a high—end black tea, grew from scratch and developed rapidly in foreign trade, it gradually became the most competitive best-selling goods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Key words: Glob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Qimen black tea; Qimen Black tea producing area; early trade

茶叶作为中国传统的对外贸易大宗商品,在国际市场上长期以来一枝独秀。欧洲人在17世纪初输入的中国茶叶为绿茶^①。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前期,英国始终保持以绿茶为主的华茶进口格局。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取代荷兰成为国际茶叶市场新的主导者,成为引领世界茶叶消费时尚的风向

[收稿日期] 2023-04-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全球史视野下的徽州茶商研究(1500—1949)”(22BZS160)

[作者简介] 康健(1984—),男,历史学博士,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明清社会经济史、徽学研究。

① 刘章才:《英国茶文化研究(1650—190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98-99页;[澳]Nick,Hall著:《茶》,王恩冕等译,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年,第271页。

标,深刻影响了国际茶叶市场的结构性变动^①。英国本土的红茶消费风尚深刻影响着欧洲其他国家饮茶风气的变化,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开始,在国际茶叶贸易中逐渐形成以红茶为主的贸易格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趋势不断得到加强^②。而当时中国几乎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产茶国,由英国主导的国际茶叶贸易新格局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红茶产业的发展和对外贸易,因此红茶制造技术由福建武夷山地区不断向北传播。19世纪以后,红茶先后在江西、湖南、湖北、安徽等地试制成功,这些地区各自形成新的红茶产区,实现了红茶产业的大规模发展,最终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孕育出品质高端的祁门红茶。

祁门红茶虽然诞生时间较晚,但因其独特的品质而后来居上,成为支撑晚清中国茶叶出口贸易残局的代表。但以往学界对于祁门红茶诞生的深刻国际背景认识不清,不仅对祁门红茶出现的时间和创始人争论不休,更对晚清祁门红茶贸易情况缺少深入考察^③。这主要是因为以往对于近代中国各地茶业经济(包括祁门红茶)发展多从区域史的视角进行考察,大多只关注各产茶区域内部情况,未能从更宏大的视野考察,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华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众所周知,18世纪中叶以来,华茶外销日盛是西方国家强力需求刺激下的产物,因此,只有从全球视野来考察华茶产销演进,才能深入认识晚清以来中国红茶制造技术传播和产业扩大的深刻背景。有鉴于此,笔者利用晚清档案、近代报刊和民间文献资料,从全球的视野来考察祁门红茶诞生的国际背景,在此基础上对祁门红茶创制时间进行重新考证,同时就晚清时期祁门红茶早期贸易发展情况进行探讨。不当之处,还请专家指正。

一、祁门红茶诞生的国际背景

茶叶传入英国后曾引起激烈争论,伴随着与咖啡、酒等饮品的长期竞争,茶叶在英国的传播历程经过初步接触、深入传播和全面普及三个阶段,到18世纪中期以后,饮茶已在英国社会形成风气^④。但因绿茶价格昂贵和英国本土饮食习惯的影响,到18世纪40年代以后,英国进口绿茶数量逐渐下降,而进口中国红茶数量逐渐增多,后者最终在18世纪中叶以后的英国取得压倒性优势。英国下午茶的出现,标志着英国茶文化完成本土化,形成了“红茶社会”。祁门红茶的诞生与世界茶叶贸易结构的变动和红茶技术在国内传播造成的红茶产区不断扩大密切相关。

(一)世界茶叶贸易结构的变动

18世纪前半期,东印度公司对华茶叶贸易主要是以绿茶为主、红茶为辅。当时出口的红茶有武夷、工夫、白毫、小种等,绿茶有松萝、屯溪、贡熙皮、贡熙等品种。173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部训令对华贸易的大班“垄断今年广州所有的绿茶”,原因是当时欧洲荷兰、法国等国商人通过走私输入英国的绿茶很多,影响了英国的正常贸易。当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寿官签订贸易合约,其中“松萝绿茶9000担,每担价格为24两,武夷红茶2300担,每担价格为22两”^⑤。

从18世纪30年代开始,东印度公司对华购买的红茶数量逐渐超过绿茶。1720年代,英国从中国进

① 刘勇:《近代中荷茶叶贸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② 刘章才:《英国茶文化研究(1650—1900)》,第99—107页。

③ 胡益坚:《胡元龙二三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祁门县委员会编:《祁门文史》第2辑,祁门县印刷厂,1988年,第21—26页;徐克定:《清末民国祁红兴衰析》,《农业考古》1994年第2期;郑建新:《祁红史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祁门县委员会编:《祁门文史》第5辑,黄山市地质印刷厂,2002年,第1—46页;康健:《近代祁门茶业经济研究》,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

④ 刘章才:《英国茶文化研究(1650—1900)》,第49—92页。

⑤ [美]马士著,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1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22页。

口的松萝绿茶还占到52%;但到了1730年代,进口武夷红茶占有45.4%,松萝茶下降至30.9%;1750年代武夷茶上升到63.3%,松萝茶为30%^①。1754年,英国“埃塞克斯号”“伊尔切斯特号”等8艘商船从广州购买红茶21224担,绿茶8686担^②。1755年贸易季结束之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管理会主任皮古预订1756年冬茶,其中,红茶15830担,绿茶4299担^③。由此可见,英国对华茶叶贸易结构呈现向红茶为主、绿茶为辅转变的新动态。

这种新的贸易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1765年贸易季,英国东印度公司共购买红茶58320担,绿茶13248担^④。即使1769年资金匮乏,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仍然派16艘商船对华贸易,共买红茶46936担、绿茶21014担^⑤。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角山荣就注意到18世纪中期,英国进口的茶叶中红茶占66%,绿茶约占34%,认为“红茶与绿茶的地位发生了逆转,英国人选择红茶的取向已固定下来”^⑥。由此可见,英国对华茶叶贸易结构形成以红茶为主、绿茶为辅的不可逆转之趋势。

18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红茶在英国对华茶叶贸易中逐渐占有压倒性地位,并从整体上影响世界茶叶贸易结构。不仅英国茶叶贸易以红茶为主,18世纪中叶以后,国际市场上红茶贸易也十分兴盛。例如,1765—1766年,丹麦亚洲公司用17280银元预付给广州行商颜瑛舍、陈捷官和邱崑,用于采购800箱武夷红茶^⑦。又如,1742—1794年,荷兰商人在广州共购入127958996磅茶叶,其中红茶占总量的90.3%,绿茶仅占9.7%^⑧。1784年贸易季,英国东印度公司管理会的亨利·皮古主任管理的9艘商船共购买红茶42089担、绿茶17968担^⑨。同年,美国第一艘商船“中国皇后号”首次抵达广州进行贸易,购买红茶2460担、绿茶562担^⑩。1792年,欧美商船从广州购买红茶209892担、绿茶6765担,绿茶仅为红茶的3.2%左右^⑪。1792年和1793年两个贸易季,东印度公司对华茶的需求总量为18370000磅,其中,红茶为13170000磅,绿茶为5200000磅^⑫,红茶占总量的71.7%,绿茶仅占总量的28.3%。

进入19世纪以后,以英国为主导的世界茶叶贸易中,红茶贸易总量迅速增长,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绿茶贸易数量锐减,处于次要地位。1806年贸易季和1807年贸易季的红、绿茶购买数量很能说明问题。1806年贸易季,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广州购入红茶21054953磅、绿茶仅为5337755磅,红茶将近是绿茶的4倍;私人散商购入红茶1256664磅、绿茶492651磅,红茶将近是绿茶的2.6倍。1807年贸易季,英国东印度公司从广州购入红茶13451133磅、绿茶4998034磅,红茶是绿茶的2.7倍左右;私人散商购入红茶1246728磅、绿茶406630磅,红茶为绿茶3倍强^⑬。183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权被废除之后,中国

① [美]简·T·梅里特著:《茶叶里的全球贸易史:十八世纪全球经济中的消费政治》,李小霞译,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年,第37—38页。

② [美]马士著,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5卷,第21页。

③ [美]马士著,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5卷,第38页。

④ [美]马士著,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5卷,第146页。

⑤ [美]马士著,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5卷,第173页。

⑥ [日]角山荣著:《茶的世界史:绿茶的文化和红茶的社会》,崔斌译,台海出版社,2021年,第49页。

⑦ [美]范岱克著:《广州贸易:中国沿海的生活与事业(1700—1845)》,江滢河、黄超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59—161页。

⑧ 刘勇:《近代中荷茶叶贸易史》,第23页。

⑨ [美]马士著,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2卷,第111页。

⑩ [美]马士著,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2卷,第112页。

⑪ [美]马士著,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2卷,第229—232页。

⑫ [美]马士著,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2卷,第285—286页。

⑬ [美]马士著,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3卷,第65页。

从事红茶出口的“红茶帮”(散商)大行其道,乘机向行商索取高价,而此时失去东印度公司庇护的广州十三行行商无力购茶,促使英国散商与这些红茶商人直接进行贸易,从而保证了英国的茶叶供应,充分说明1830年代世界茶叶市场红茶贸易已经十分兴盛^①。

在英国的影响下,北美殖民地原本也以红茶消费为主。仅1784年,“中国皇后号”运到美国的武夷、小种等红茶就有327918磅,绿茶为74915磅^②。但独立战争结束后不久,美国消费者的口味逐渐丰富化,从一味依赖武夷红茶转向饮用口感更加丰富的小种、白毫、熙春、松萝、雨前、珠茶等茶叶品种^③。尽管如此,但为谋求商业利益,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美国仍然从中国和欧洲等地进口不少红茶,并不断向欧洲、加拿大等国再出口红茶^④。19世纪早期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中,有27%左右被转运到欧洲出售。1820年的调查显示,美国的邻国加拿大人喝的茶叶中有3/4来自美国的走私茶叶^⑤。1821年,美国商人运往欧洲的红茶为6858担,绿茶为6300担,红茶多于绿茶^⑥。1832年,美国从广州购入很多茶叶运往欧洲,其中红茶11835磅,绿茶7588磅^⑦。美国商人显然是看到红茶贸易在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具备广阔的市场空间,因此有利可图并采取行动,这些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世界茶叶市场形成以红茶贸易为主的贸易格局。

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由英国主导的世界茶叶市场呈现出以红茶消费为主的新格局,并迅猛发展,对红茶的需求日益扩大。在19世纪初的广州市场上,洋商购买的红茶越来越多^⑧。19世纪上半叶的鸦片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五口通商,更进一步促进华茶出口贸易。在接连不断的外部刺激下,中国红茶制造技术不断传播发展,红茶产业从福建武夷山地区不断北传到湖南、湖北、安徽等地,最终在六七十年代形成众多红茶产区,祁门红茶也因此应运而生。

(二)国际贸易影响下中国红茶产区的拓展

1800年前后,红茶制造技术从武夷山传到江西义宁州地区,当地逐渐改制红茶,出现品质甚高的“宁红”,打破了中国红茶只局限于武夷山地区的情况。1849年,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对宁红的早期发展情况进行系统阐述。具体如下:

江西省沿鄱阳湖的产茶区,在最近50年中,已发展为一个重要的茶区,所有婺宁及宁州茶都是这个地区出产的,并且大量输往欧美。在东印度公司专利时期,最好的红茶均为福建省所产,驰名的武夷山附近的星村及崇安等镇,过去为东印度公司输出的最好红茶的主要市场。那时江西省的宁州一带茶区仅以绿茶闻名。而现在以及过去多年,福建红茶虽然曾大量输出,但宁州茶区所产的红茶也已为世人所重视,而且,我相信,它在伦敦市场上,一般均售得极高的价格。

如果现在还有人固执起见,认为只有所谓的绿茶区才能种绿茶,只有武夷山区才能种红茶,他就很难相信我对宁州茶区由种绿茶改为种红茶的叙述。但是不管放弃原有的偏见是怎样困难,“事实是难以歪曲的”,而我要说的真实情况是完全可以相信的。

很多年前,一位勇敢的中国商人看清了很容易用同样的茶叶制出红茶和绿茶,便在宁州

① [英]格林堡著:《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康成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73-174页。

② [美]简·T·梅里特著:《茶叶里的全球贸易史:十八世纪全球经济中的消费政治》,李小霞译,第217页。

③ [美]简·T·梅里特著:《茶叶里的全球贸易史:十八世纪全球经济中的消费政治》,李小霞译,第203页、第219页。

④ [美]简·T·梅里特著:《茶叶里的全球贸易史:十八世纪全球经济中的消费政治》,李小霞译,第230-232页、239-241页。

⑤ [美]简·T·梅里特著:《茶叶里的全球贸易史:十八世纪全球经济中的消费政治》,李小霞译,第240-241页。

⑥ [美]马士著,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4卷,第5页。

⑦ [美]马士著,区宗华译,林树惠校、章文钦校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第4卷,第382页。

⑧ [美]简·T·梅里特著:《茶叶里的全球贸易史:十八世纪全球经济中的消费政治》,李小霞译,第238页。

茶区制出一批红茶运往广州销售。广州的外商对这种茶叶极为赞赏。同时,我听说,宝顺洋行买下了这批茶叶,运往英国。运至英国后,销路甚佳,并且马上成为一种头等的红茶。此后销路年年不断增加,同时中国茶商也经常源源供应。到现在,宁州茶区只出产红茶了,而以往宁州是只产绿茶的。如果没有其他证明,这件事就足以说明任何不同的茶叶都能制出红茶或绿茶,成品茶叶的颜色完全是随制作方式为转移的。^①

以上阐述中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宁州以前只产绿茶,直到“最近五十年”,即1800年前后,因由英国主导的世界茶叶市场中红茶贸易兴盛,宁州由绿茶改制红茶。第二,宁红最初被运往广州销售,经宝顺洋行再运至英国,结果十分走俏,成为一种头等的红茶。以此为契机,宁州全面改制红茶,成为著名的红茶产区,不再制作绿茶。第三,从福琼书写的这段文字中可以得知,宁红创制最迟不晚于1800年前后。

关于宁红,民国学人王兴序也称:“中国红茶,始于福建,西人称福建红茶,为南方工夫茶,厥后传至西湖及江西之武宁、义宁二州。”^②因此,义宁州成为武夷山红茶之后中国第二个红茶产区当无疑问。1849年6月,英国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在江西考察茶业经济时说:“众所周知,鄱阳湖附近的宁红产区,这儿出产的高级红茶声誉日隆,但以前这儿只出产绿茶。”^③由此可见,在1840年代宁红发展迅速,鄱阳湖附近已成为优质红茶产区。

五口通商后,西方列强对华茶需求猛增,中国红茶产业发展日新月异。在红茶制造技术传播过程中,闽粤商人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广州十三行贸易体制时期,作为行商的闽粤商人掌控华茶对外贸易,谙熟国际茶市的讯息变化。五口通商以后,广州体制被打破,但长期从事华茶对外贸易的闽粤商人以敏锐的商业眼光,抓住国际茶市对红茶需求日盛的商机,将制茶技术带到内地的两湖地区,有力地促进了红茶产区的扩大,两湖红茶由此诞生,并迅猛发展。近来荷兰学者乔治·范·德瑞姆亦云:“从19世纪40年代起,广东商人开始开发和生产红茶,以应对欧洲在荷属东印度群岛和英属印度生产的新红茶在全球流行的挑战。”^④说明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的世界茶叶市场中,红茶已独步天下,并且中国红茶也开始受到爪哇和印度红茶的竞争。

湖北崇阳县,道光以前多是晋商在该县西沙坪等地采办黑茶,出西口贸易,但五口通商以后发生重大变化,“道光季年,粤商买茶,其制采细叶暴日中揉之,不用火炒,雨天用炭烘干,收者碎成末,贮以枫柳木作箱,内包锡皮,往外洋卖之,名红茶。”^⑤可见,1840年代崇阳县已改制红茶,并出洋贸易。

湖南巴陵县,“道光二十三年(1843),与外洋通商后,广人每携重金来制红茶,土人颇享其利。日晒者色微红,故名红茶。昔之称兰芽、锅青用火焙者,统呼黑茶矣”^⑥。也是在五口通商后,由广东商人携资到当地改制红茶,从而改变原来只产黑茶的单一茶叶产业结构。

湖南平江县,“道光末,红茶大盛,商民运以出洋,岁不下数十万斤”。到了同治年间,红茶贸易更盛,茶叶种植甚广,“第近岁红茶盛行,泉流地上,凡山谷间向种红薯之处,悉以种茶”^⑦。因太平天国战乱影响,武夷茶区遭受重大冲击,闽粤商人携带巨资到两湖地区倡制红茶。其中,湖南安化红茶颇为典型。同治《安化县志》记载:

①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第1473-1474页。

② 王兴序:《安徽秋浦祁门两县茶业状况调查》,《安徽建设》1929年第6期。

③ [英]罗伯特·福琼著:《两访中国茶乡》,敖雪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74页。

④ [荷]乔治·范·德瑞姆著:《茶:一片树叶的传说与历史》,李萍、谷文国、周瑞春、王巍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118页。

⑤ [清]高佐廷修,傅燮鼎纂:同治《崇阳县志》卷四《物产·货类》,同治五年刻本。

⑥ [清]潘兆奎修,吴敏树纂:同治《巴陵县志》卷十一《风土·土产》,同治十一年刻本。

⑦ [清]张培仁修,李元度纂:同治《平江县志》卷二十《食货志·物产》,同治十三年刻本。

咸丰间,发逆猖狂,闾客裹足,茶中滞者数年。湖北通山夙产茶,商转集此。比逆由长沙顺流而窜。数年,出没江汉间,卒之通山茶亦梗。缘此估帆取道湘潭,抵安化境,倡制红茶收买,畅行西洋等处,称曰广庄,盖东粤商也,方红茶之初兴也。^①

从上引文字可知,咸丰年间因太平天国战乱影响,晋商无法入闽采办红茶,于是广东商人携资进入安化,倡制红茶获得成功,并将安化红茶贩运西洋销售。这些出洋贸易的红茶都称为“广庄”,由此可见,广东商人在安化红茶贸易中具有首创之功。同治年间,醴陵县“红茶利兴,三四月间,开庄发拣”^②,红茶贸易也发展起来。

不少民国调查报告也印证了方志中有关湖南安化红茶改制的过程。1935年,著名茶学家吴觉农在《湖南省茶叶视察报告书》中称:“当清道光二十年(1840)前后,英人之在粤南之对华贸易,已有相当进展,时输出品以茶为大宗。两粤茶产不多,爰由粤商赴湘示范,使安化茶农改制红茶(国内以前所产者多为绿茶,不知制造红茶)。因价高利厚,于是各县竞相仿制,产额日多,此为红茶制造之创始,亦即湖南茶对外贸易发展之嚆矢。”^③1937年,全国经济委员会的茶业调查报告中也提及安化红茶的创制:“前清咸丰初年,闽粤商人因红茶在西洋销路日广,乃携茶师及资金至东坪等处开厂制造,后因获利甚厚,除本省商家趋之若鹜外,燕晋陕人继之,于是红茶遂逐渐成为该县出产大宗。”^④这些都印证了闽粤商人在安化改制红茶及其红茶贸易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19世纪中叶的咸同年间,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红茶的巨大需求,极大地刺激了闽粤商人将红茶制造技术从闽粤沿海带到中国内陆的两湖地区,促进了两湖地区纷纷改制红茶,并成为著名的红茶产区。安徽作为中国最为重要的产茶区也深受国际上“红茶大盛、绿茶滞销”贸易格局的影响。台湾学者陈慈玉也注意到这个现象:“五口通商之后所增加的输出茶主要是红茶,绿茶虽然也增加,但数量有限。”^⑤与此同时,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红茶、绿茶外销过程不断受到英属印度、锡兰红茶和日本绿茶的严重冲击^⑥,由此造成国际贸易中以红茶为主和中国绿茶外销滞销的格局进一步加强。这种新的贸易格局促进中国红茶产业不断发展,推动红茶创制技术不断进步。祁门红茶的出现就是为应对世界茶叶市场中红茶贸易、红茶消费为主的新格局应运而生的,并逐渐成为国际贸易中不可替代的高端红茶。关于祁门红茶的创制情况,将在下文详述。

二、祁门红茶创制时间新考

关于祁门红茶创制时间,学界众说纷纭,但主流观点集中在光绪元年(1875)、二年(1876),也就是1875年前后;在创始人方面也存在余干臣、胡元龙、陈丽清等不同说法。因以往的研究视角大多局限于狭小的县域范围,没有从全球视野审视祁门红茶的创制经过,因此从学理上、逻辑上来说,目前学界关于祁门红茶创制时间的观点都存在不少问题。下面笔者就祁门红茶创制的时间进行重新考证。

(一)祁门红茶创制旧说的检讨

祁门红茶创制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是近代中国茶业经济发展史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但关于祁红

① [清]邱育泉修,何才焕纂:《安化县志》卷三十三《时事纪》,同治十一年刻本。

② [清]徐淦修,江晋光纂:《增修醴陵县志》卷一《风俗》,同治九年刻本。

③ 吴觉农:《湖南省茶业视察报告书》,《中国实业》1935年第1卷第4期。

④ 全国经济委员会:《中国茶业之经济调查》,全国经济委员会1937年,第31页。

⑤ 陈慈玉:《近代中国茶业之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24页。

⑥ 程天绶:《印度锡兰茶业概况与华茶之竞争》,《国际贸易导报》1934年第1卷第6号;林齐模:《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以对英国出口为中心》,《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的创始人,目前学界仍众说纷纭,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说法:

一是胡元龙说。1915年,谢恩隆、陆淦对祁红产区全面调查之后,在《调查祁浮建红茶报告书》中指出:

安徽改制红茶,权舆于祁建,而祁建有红茶,实肇始于胡元龙。胡元龙为祁门南乡之贵溪人,于前清咸丰年间,即在贵溪开辟荒山五千余亩,兴植茶树。光绪元二年间,因绿茶销场不旺,特考察制造红茶之法。首先筹集资本六万元,建设日顺茶厂,改制红茶,亲往各乡教导园户,至今四十余年,孜孜不倦。^①

谢、陆二人提出胡元龙在咸丰时间即开始开山种茶,进行绿茶贸易,光绪初年因绿茶贸易不畅,于是改制红茶。这也是以往学界所知关于祁门红茶创始人胡元龙改制红茶最早的资料来源,因而被学界广泛征引。

二是余干臣说。民国时期著名茶叶专家傅宏镇到祁门县进行茶业调查,他对祁红的创立有着这样的描述:

一八七六年(光绪二年),有黟县余某(余干臣)来自至德县(即前秋浦),于历口开设子庄,劝诱园户制造红茶,出高价以事收买。翌年,设红茶庄于闪里,虽出产不多,但获利颇厚,此为祁门红茶制造之始。^②

傅宏镇明确提出黟县茶商余干臣于光绪二年(1876)、三年(1877)在祁门西乡著名的产茶地区历口、闪里分别设立茶庄,开始制造红茶。

三是余干臣、胡元龙共同创立说。王兴序曾对祁门、秋浦两县进行茶业调查,他在《安徽秋浦祁门两县茶业状况调查》一文中云:

中国红茶,始于福建,西人称福建红茶,为南方工夫茶,厥后传至西湖及江西之武宁、义宁二州。安徽自昔向制青绿茶,改制红茶,实肇于秋浦。当民国纪元前三十七年,有黟人余姓,在秋浦尧渡街地方,设红茶庄,试制红茶。翌年,旋往祁门设子庄,劝导园户釀色遏红诸法,出高价收买红茶(指毛茶)。第三年,即在祁门西乡闪里,开设红茶庄。祁门南乡并有大园户胡仰儒者,特自制园茶,以为之倡,此为徽茶改制红茶之始。^③

从上引文字来看,王兴序显然是杂糅了谢恩隆和傅宏镇两种说法,提出光绪元年余干臣和胡元龙分别在祁门西乡和南乡制造红茶,从而创制祁红。这种说法也被学界普遍认同。

需要注意的是,以往学界提出祁门红茶创始人和创制时间的观点存在明显的问题:第一,利用的资料都是民国时期调查资料,或口述史料,没有利用多种史料进行互证,更未利用原始文书档案资料,因此在“资料的原始性”上存在明显不足。二是将祁门红茶产区限于祁门一县,没有从更大的空间视角来考察。事实上,祁门红茶并非仅产自祁门,还应包括建德(民国时期先后改为秋浦、至德)和江西浮梁两县所产红茶在内,因其品质与祁门所产者相似,历史上皆以“祁红”统称之。

1909年,《商务官报》记载,“祁门、浮梁、建德三县之茶(向统称之为祁茶)”。^④1917年《安徽实业杂

① 谢恩隆、陆淦:《调查祁浮建红茶报告书》,《农商公报》1915年第13期。该资料又见《奏请奖给安徽茶商胡元龙奖章由》,《农商公报》1916年第8期;《安徽茶商胡元龙改制红茶成绩卓著请给予本部奖章折》,《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1916年第4期;该文后收录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70—1919)》(第2卷),中华书局,1962年,第104页。学界目前普遍运用的资料是《奏请奖给安徽茶商胡元龙奖章由》(《农商公报》1916年第8期),而1915年该报发表的《调查祁浮建红茶报告书》(《农商公报》1915年第13期)中的资料却没有得到运用。经过分析,笔者认为《调查祁浮建红茶报告书》才是关于胡元龙创制祁门红茶最早的记载“母本”,值得关注。

② 安徽省立茶业改良场编辑:《祁门之茶业》,中国纺织印务有限公司,1933年,第1页。

③ 王兴序:《安徽秋浦祁门两县茶业状况调查》,《安徽建设》1929年第6期。

④ 《茶业改良议》,《商务官报》第4册,1909年第26期,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82年,第495页。

志》也称：“安徽祁门茶，品质甲于全球，秋浦毗连祁门，西人亦名祁茶。江西之浮梁红茶，因与祁门接壤，亦曰祁茶。”^①民国著名茶学家吴觉农亦云，“所谓祁门红茶，并非祁门一县境内之生产品。其运境之至德（秋浦改称，原称建德）及浮梁两县之所生产，亦谓之‘祁门红茶’，简称‘祁红’，抑或仅称‘祁门’。祁门、至德，属安徽省，浮梁属江西省，以其同产红茶关系，故‘祁浮建’，久成当地习语，若已不复知有省限矣。”^②但三县之内确以祁门出产为最佳。全盛时期，祁门红茶出口十万箱，安徽祁门、至德所产则占有七八万箱^③，其中祁门一县出产红茶就占四五万箱^④。1909年《日本通商汇报》调查中国茶情后指出，“今年中国各地茶况，闻惟祁门茶品质颇良，徽宁茶未有改善之迹。汉口茶概与寻常相等，祁门茶运至汉口者八万五千箱，宁州茶一万箱”^⑤。民国时期，祁门茶业改良场场长胡浩川亦云：“祁门红绿茶，品质全美，完全由于色香味三者俱备，他县的茶叶，有色无香，有香无味，不能三者俱备。”^⑥

由此可知，祁门红茶产区在地域上涵盖祁门、建德和浮梁三县，其中以祁门产量最多、品质最优，因此三县出产的红茶都统称“祁门红茶”，简称“祁红”。因此，探讨祁门红茶的创制过程在地域上应涵盖以上三县范围，即祁门红茶在三县先后出现，才意味着祁门红茶最终定型。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以往关于祁门红茶创制时间的观点在逻辑上和学理上都存在严重偏差。有鉴于此，对祁门红茶创制时间进行重新考证显得十分必要。

（二）祁门红茶创制时间新考

上文已明确祁门红茶产区范围应涵盖祁门、建德、浮梁三县。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新生事物从出现到发展到壮大都需经历长期过程。具体到祁门红茶而言，祁门、建德、浮梁三县出现红茶的时间先后不一。换言之，祁门红茶率先出现于其中某县，此为祁门红茶的萌芽阶段。随即该县陆续带动周边其它两县改制红茶，至三县依次成功实现红茶改制，祁门红茶才最终形成。下面就上述三县红茶出现时间进行综合考察。首先考察祁门改制红茶的时间。谈及祁门红茶创制源流，必须涉及与祁门相邻的江西义宁州及其所产的“宁红”，此为祁门红茶创制的源头之一。被誉为祁门红茶创始人之一的胡元龙也是在江西义宁州请茶师舒基立到祁门贵溪来帮助改制红茶，由此创立祁门红茶的^⑦。1936年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对江西宁州红茶进行考察时指出：“宁红之精制方法与祁红大致相同，盖祁红制法即源于宁红者也。”^⑧因此，祁门红茶创制技术来源于宁红是有确凿根据的。宁红诞生于19世纪初，与国际市场形成以红茶为主的贸易格局密切相关。这对于考察祁红创制时间也颇有裨益。由前所述，祁红又源于宁红，因此，祁门红茶的诞生与国际茶市格局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关于黟县茶商余干臣来祁门从事茶叶贸易，尤其是改制红茶一事，学界普遍认为是在光绪初年。其实，事实并非如此。从新见的总理衙门档案来看，早在咸同之际，余干臣就来祁门从事茶叶贸易，而且当时他还以假冒洋商之名，行私茶贸易之实，逃避厘捐，是一个典型的奸商，并由此引发了一场中外贸易纷争。

① 《民国六年上半期安徽红茶与赣湘鄂茶汉口市场逐月比较统计表》，《安徽实业杂志》1917年续刊第7期。

② 吴觉农、胡浩川：《祁门红茶复兴计划》，《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1933年第7期。

③ 陈兆涛：《华茶概略并最近三年出洋状况》，《申报》1928年9月24日，《申报》编写组编：《申报》第250册，上海书店，1985年，第697页。

④ 陈君鹏：《祁门茶农生活》，《新人周刊》1937年第38期。

⑤ 杨志洵：《中国茶况》，《商务官报》第4册，1909年第18期，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年，第345页。

⑥ 胡浩川：《祁门的茶叶》，《国产月刊》1949年第2期。

⑦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祁门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祁门文史》第5辑，黄山市地质印刷厂，2002年，第137页。

⑧ 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江西宁州红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民国史料丛刊》第554册，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336页。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两江总督曾国藩在给总理衙门的奏折中称:

据护江西九江道蔡锦青禀称,本年九月十九日,准英国驻劄九江领事官佛礼赐照会,内开宝顺洋行在徽州祁门县地方租设栈房,采买茶叶。今有祁门县知县史懌悠,突于八月二十四日,带回差役,到栈假托稽查,平空讹索,捏称漏税,即将栈中茶叶尽行封住,随将司事人余干臣等,趋押而去,逼勒捐输银一万两。因查厘金一款,随处完捐,均是报效。本年茶叶运赴九江码头,所有捐厘一事,由景德镇每担捐银一两四钱,尧山每担捐银二钱,湖口每篓六十五斤,捐银二钱。该行厘遇卡即完,并无偷漏情弊。至在栈之茶,尚未出门,不得谓其漏税而封,且和约规条具在,所有内地出口各货抽厘,俱照出口关税减半。茶叶出口,例税每百斤纳银二两五钱,遵照税则,减半完厘计算,已有盈无绌。该县何得又平空勒索,妄加例外之捐,实属不晓事务,有碍通商章程。用特照会,请烦查照,希即转移皖南道速飭该县,将讹索英商宝顺洋行银货,剋日发还。倘有疏虞,决不干休,毋任阻扰,致干和好等因到道,准此卑护。^①

在上引曾国藩的奏折中可知,祁门县知县史懌悠在当年八月二十四日,以偷漏税的名义,将所谓在祁门开设栈房的“宝顺洋行”之茶叶及司事余干臣押解,并要求其捐输银一万两。从这份奏折中得知,早在咸丰十一年(1861),黟县茶商余干臣就曾与英商串通,假冒洋商名义来祁门县开设行栈,进行不正当的茶叶贸易,而并非以前学界所认为的“光绪初年说”。

此前学界对余干臣商业贸易多是正面评价,强调其创制祁门红茶所带来的变革意义。但从档案资料来看,余干臣不仅早在咸同之交就来到祁门从事茶叶贸易,而且是个唯利是图的奸商,为牟取暴利,不惜与洋商串通起来,进行不正当贸易,其负面的商业影响跃然纸上。以前对徽商商业影响多正面评价,但近年来卞利教授撰文指出,徽州本土和域外徽商出现正负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②。而祁门红茶早期创始人之一的余干臣则为徽商的负面形象提供了一个绝佳注脚。

结合福琼所言,宁红早在19世纪初就被运到广州,通过宝顺洋行出口贸易。由此可见,宝顺洋行在中国采购的是红茶。1861年,黟县茶商余干臣在祁门南乡替英国宝顺洋行收购的茶叶也当为红茶。此外,民国时期黟县郑恭在《杂记·祁门红茶源流》中记载:

民国纪元前五十年,有邑人胡元龙、陈烈清相继在祁门西南乡创设茶厂,招工授以焙制方法,祁红才开始萌芽。这两家茶厂算是制茶最早,名胡日顺、陈怡丰。^③

若如郑恭上述所言,早在咸丰十一年(1861),祁门南乡的胡元龙、西乡的陈烈清就开始制造祁门红茶。根据族谱记载,陈烈清,当为陈丽清,为祁门西乡桃源人^④。由此可见,以往学界一直错误地认为其名字是“烈清”。学界长期将其误作“烈清”的原因在于对其红茶贸易的了解多依据民国报刊调查资料,对其所在家族资料挖掘整理不足。综上所述,从总理衙门档案和郑恭两方面的记载来看,祁门红茶最早出现的时间应该不晚于1861年,而非传统学界主流观点提及的1875年。

其次考察建德改制红茶的时间。1883年《益世录》记载:

建德为产茶之区,绿叶青芽,茗香遍地,向由山西客贩至北地归化城一带出售。同治初年,

①《安徽祁门县英商私行设立茶栈应恐华商假冒抗捐》,总理衙门档案,档号:01-31-004-01-006,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

②卞利:《论徽州本土和域外对徽商形象认同的差异及其原因》,《学术界》2019年第4期。

③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第172页。

④(60世)陈光楷,行麟,二百八九,名天水,字丽清,清由监生例授县丞銜。生于道光二十年庚戌六月三十日寅时,妣汪氏,生于道光二十五年乙丑五月十九日,歿于光绪二十年甲午十一月初八午时。继娶插院敦本堂王氏,生于同治十二年癸酉十月初八酉时。妣方氏,生于同治十年辛未十月初八寅时,歿于光绪辛丑年四月二十二寅时。《桃源陈氏宗谱》卷7《世系·保极堂志晟公支》,光绪三十年刻本)

则粤商改作红茶,装箱运往汉口。浮梁巨贾,获利颇多。自光绪四年后,茶价渐低,因而日形减色。今岁价更不佳,亏本益甚,故茶商之往建者,较往年仅得一半,而市面荒凉几无过问。其茶引税项,本由邑令请领督宪引票,设局征收,夏终汇集。近因生涯寥落,虽已开捐,终未能日新月异盛也。^①

上文透露出几个重要信息:第一,安徽建德县在同治以前一直以出产绿茶闻名,这些绿茶由晋商收购,贩运到归化城销售。第二,建德县一直出产绿茶,但在同治初年,由广东商人引导改制红茶,运往汉口出售,红茶贸易由此崛起。也就是说,建德从绿茶改制红茶的时间在同治初年,也就是在1860年代。

建德创制红茶的时间在19世纪60年代的情况,在清末调查中也得到印证。1910年,陶企农对皖苏浙鄂茶务进行调查^②,其在皖南建德调查时提出:

建邑改制红茶,行销洋庄,始于前清同治五年,有粤人携带茶师、器具来此试制。由是风气渐开,祁门、浮梁又在其后。^③

可见,建德由绿茶改制红茶的时间始于同治五年(1866),直接动力则是由于广东商人带茶师来建德县创制。这与《益世录》记载建德红茶出现在同治初年的记载基本吻合,颇为可信。但这与上文矛盾的是,陶氏言祁门出现红茶在建德之后。因对祁门红茶出现时间的考察是陶氏调查所得,并非有确凿史料记载,与上档案史料所言有本质差别,故此不足为信。

需要指出的是,1915年谢恩隆、陆澐在祁门红茶产区的祁门、浮梁、建德进行考察,谈及红茶沿革:

安徽向制青茶,改制红茶实肇始于建德。当民国纪元前三十七年,即有黟县人余姓在建德尧渡街地方设红茶庄,试制红茶。翌年,即往祁门设子庄,劝导园户酿色遏红诸法,出高价收买红茶(指毛红茶)。第二年,即在祁门西乡闪里开设红茶庄。祁人胡君仰儒,本南乡大园户也,特自制红茶以为之倡,此为徽茶改制红茶之始。^④

上引谢、陆二人所撰调查报告多依据从民间搜集的口碑资料。他们提出安徽红茶始于光绪元年(1875)的建德,当时由“余姓”(这里指余千臣)在建德尧渡街开设红茶庄,试制红茶。1876年,余氏到祁门设立子庄,劝导园户改制红茶;1878年,余氏又在祁门闪里开设红茶庄。同一时期,祁门南乡胡元龙(字仰儒)也在南乡自制红茶。当时调查的这种观点,后来被现代学者广泛认同,成为祁门红茶出现时间的主流观点。但通过上文的考察可知,民国初年谢、陆二人在祁门红茶区考察中提出的这种认识并没有说明其“史源”。换言之,他们的观点没有可靠的文字史料支撑,多半依据民间考察搜集的口碑资料。而这种认识显然与笔者上文引用晚清档案和当时史料的记载相矛盾,故也不足为信。综上所述,建德改制红茶的时间在祁门之后,即在同治五年(1866)左右。

最后考察浮梁改制红茶的时间。浮梁是祁红产区三县中出现红茶时间最晚的,大致在光绪初年前后。笔者目前所见最早提及浮梁改制红茶的史料为晚清文人吴秉久撰写的《礞村汪雨高容赞》,其内容如下:

汪府修职郎、姻叔台印,泮字雨高者,吾乡隐君子也。光绪丙戌,延予课侄若孙于应龙庵,

① 《建德茶市》,《益闻录》第267号,光绪九年五月二十三日。

② 陶企农的调查是在1910年,但其调查文稿在生前并未发表,而是在其去世之后,由其外甥节选其文稿内容,在1915年分两期连载发表在《中华实业界》第5期、第6期上。其外甥称:“著者为山阳陶企农先生,先生郡城右族,……先生余舅氏也,垂爱甚至,向者每值一事,不惮十反。观其纤细精密,于兴衰之故,利弊之原,足称茶务历史。想见先生实事求是之至意,不同寻常游记也。原件甚长,择录要者以著于端,来者庶知所审择。……就先生所查,尚为五年前事。”由此可见,陶氏调查文稿成文于1910年无疑。

③ 陶企农:《调查皖苏浙鄂茶务记(续)》,《中华实业界》1915年第2卷第6期。

④ 谢恩隆、陆澐:《调查祁浮建红茶报告(续一)》,《农商公报》1915年第14期。

交道接礼,三年弗衰。翁没,复馆于潭府三年,以权□。翁颇悉,翁雁行二,少失怙恃,虽食贫而祭葬尽礼。析爨后,立志生理,采市香茗,服贾苏杭,获息者数倍。迨同治甲戌,改绿甲为红丁,出浔江,达汉阳,与洋商交易。嗣是而茶务日隆,家业日起矣。翁创置田产二百余亩,购山材,建屋宇,统约需数万金。方之陶公、桑宏羊,□多让□。谊笃亲亲,尊甫荣息。^①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浮梁汪雨高少年贫寒,在分家析产后开始闯荡商海,从事茶叶贸易。他最初在苏杭一带经商,颇有起色。同治甲戌(1874),他改“绿甲为红丁”,即由绿茶改制红茶,并将红茶贩运九江、汉阳等地和洋商交易,由此发家致富。由此可见,浮梁最早改制红茶的当为礞村的汪雨高,时间为同治十三年(1874)。

前引陶企农在祁门考察茶务时,对祁门红茶出现的时间也提出看法:

屯溪查毕,即赴祁门,至茶业公所访谢绅余庆、徐绅文卿,又至城乡各茶号,逐节参考。据云祁门改制红茶,始于清光绪二年,由黟县余姓来此试办,四年又有广东人来此改制,江西浮梁仍后五年。^②

谈及祁门红茶创制时间时,陶氏小心谨慎地使用“据云”字眼,显然这些观点并非他从原始资料中看得,而是在祁门当地一些士绅、商人那里听说的。按照当时祁门士绅的观点,祁门红茶是在光绪二年(1876)黟县余姓(余千臣)来祁门创制的。光绪四年(1878),广东人又来祁门改制红茶,而浮梁出现红茶仍在“后五年”,即光绪七年(1881)。

1937年,《江西浮梁县之茶叶》谈及浮梁红茶源流时提出:

普通所称“祁红”者,即包括祁门、至德、浮梁产之红茶而言。据当地老者所称,该县“祁红”之制造,发轫于北乡礞村,盖在前清嘉庆年间,该地即有“青茶”出售于市,最早者曰“撒手青”,畅销于关中一带。至清光绪二三年间,因有广东商人效两湖制造红茶之法,在皖属秋浦县(即今至德县)设庄监制红茶,引起礞村一带青茶商之注意。翌年(光绪四年)春间,该村亦随之设立茶庄仿造,时仅一家,次年增至二家。至光绪七八年之间,则附近之闪里(皖境)、勒(历)口一带,亦相继成立茶庄。自光绪十年以后,即遍及浮属各乡矣。至民国以后,政府为求改进红茶起见,特在浮属峙滩购地设立茶业试验场,乃历时数载,成绩毫无,徒耗公帑耳。^③

从这份浮梁茶业调查可以看出:第一,祁门红茶产区包含祁门、浮梁、至德三县。第二,调查者根据当地“老者”所言,提出浮梁在清嘉庆至同治时期制作的是青茶,在关中一带畅销。到光绪二三年间,广东商人将两湖红茶制法引入安徽秋浦(清代称建德,民国中期改为至德),在当地创制红茶成功。第三,粤商在安徽建德改制红茶引起了浮梁礞村一带经营青茶商人的注意。因此,在光绪四年(1878)春季,浮梁礞村茶商也开始在村中仿制红茶。1879年时,当地已有2家经营红茶的茶庄。第四,光绪七八年,与浮梁接壤的祁门闪里、历口一带出现经营红茶的茶庄。当然,这种认识与前文的时间存在差异,因而是不可靠的。第五,光绪十年(1884)开始,浮梁红茶发展迅猛,以风靡全县。总之,这份调查认为浮梁红茶出现在光绪四年(1878)。

1942年的民国调查对浮梁红茶源流的论述更为详细:

浮茶史迹,□无记载,据浮梁茶业工会汪建钧君之讲述并参照年来赣茶叶管理演变情形,略志浮梁茶八十年来历史梗概,以供研究茶事者之参考。

浮茶在同治四、五年时,虽常有粤客来礞村购茶,然当时茶务毫无系统,有制青茶用蔑篓包

① [清]汪纯光:《杂膳》,抄本。

② 陶企农:《调查皖苏浙鄂茶务记(续)》,《中华实业界》1915年第2卷第6期。

③ 《江西浮梁县之茶叶》,《工商通讯》1937年第15期。

装,每篓有六十斤(增平十六两,即所谓司马秤),运苏州出售者;有制软枝用布袋,每袋六、七十斤,运芜湖、镇江,或参加两湖茶叶运汉口出售者;在汉口设有毛茶行,有制□茶,用篾篓包装,分四小篓合成一大篓,运赣江越柏岭向广东佛山镇出售者。同治八年(1869),统改制青茶,每岁关东客入内地收买一次,青茶亦用篾篓包装,其毛峰最高价每担四、五十元,同治八、九年产量渐增,同治十年(1871)始仿河口、德兴、婺源制法统改为绿茶,以汉口为销售市场。光绪元年(1875),因粤客由沪携制造红茶器具入乡,至皖省至德尧渡街制茶,翌年礞村同馨、义顺两茶号,遂创制红茶。此为浮红之滥觞,当以红茶制法简易,极省人力,故茶商多仿制之。至光绪四年(1878),祁西闪里之怡丰茶号、历口之义(亿)同昌茶号亦相继仿制。故当光绪八、九年红茶鼎盛时代,浮红产量有六万余箱,与祁红数量相伯仲,而潘村同馨号首仙芽大面,竟□英商天裕、怡和两洋行竞买,并有请其将仙芽箱数扩至一倍之要求,此为浮红之黄金时代,乃以浮梁茶商在汉口经营上未能注意,以致浮红反纳入祁红名称之内。^①

上文谈及浮梁红茶发展史的文字颇为重要,值得关注的有以下几点:第一,谈及浮梁红茶源流的文字是当时调查者在整理浮梁茶业工会汪建钧先生讲述内容和赣茶叶管理演变情形的基础上得出来的结论。第二,调查者提出,同治八年(1869)以前,浮梁茶叶制作、发展比较混乱,广东商人来浮梁贩运的茶叶既有青茶,也有软枝茶,销售市场则有苏州、汉口、芜湖、镇江、广东佛山等地。直到同治八年,浮梁才统一改制青茶,并在同治十年(1871)采用河口、德兴、婺源等地制法改制绿茶,统一以汉口为销售市场。第三,光绪元年,广东商人将红茶制法引入安徽建德县,在尧渡街改制红茶成功。在光绪二年(1876),浮梁礞村同馨、义顺两个茶号学习建德红茶制法,开始改制红茶。这成为浮梁红茶滥觞。换言之,浮梁红茶在光绪二年出现。第四,光绪四年祁门西乡闪里怡丰茶号、历口亿同昌茶号也相继改制红茶。这种认识与上文提及的陶企农在祁门西乡调查红茶提出的“四年又有广东人来此改制”的观点一致。第五,调查者对浮梁、祁门两地红茶兴衰情况进行比较,并得出结论。他们认为光绪八九年是浮梁红茶发展的黄金时代,当时浮红产量有6万多箱,与祁门所产红茶数量不相上下。但后因浮梁茶商在汉口经营红茶贸易中未能按章办事,造成浮红丧失独立发展道路,被纳入祁红范畴,以“祁红”统名。这种认识虽然失之偏颇,但浮红、祁红此消彼长的情况则是客观事实。实际上,浮红被纳入祁红产区,成为“祁红”产区范围之一,主要是因为祁门红茶品质最优、产量最大,在国际市场上声誉最佳,而并非因浮梁茶商经营不善所致。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浮梁红茶出现时间有同治十三年、光绪二年、光绪四年、光绪七年等几种不同说法。但毋庸置疑的是,无论哪种说法,浮梁红茶都应出现在光绪初年前后。换言之,浮梁红茶出现的时间,在祁门、建德之后,是祁门红茶产区中最晚出现红茶的。

综上所述,通过对祁门红茶产区所属祁门、建德、浮梁三县红茶出现时间的细致考察可以得知,以往将祁门红茶产区局限在祁门一县,并将光绪元年定为祁门红茶出现的时间是不正确的。通过笔者考证,祁门红茶出现的时间并非局限在某个具体时间点,而是经过了长期的发展过程。早在1861年前后,祁门当地就出现红茶,这是祁门红茶出现的萌芽阶段。当时因处在太平天国战乱环境下,影响力有限。到同治五年前后,战乱结束,建德茶叶也出现“绿改红”,建德成为红茶产区,这是祁门红茶出现的第二阶段。到同光之际(同治十三年、光绪二年至七年),江西浮梁受到祁门、建德等地红茶发展影响,也改制红茶,成为祁红产区。这是祁门红茶完全形成的最终定型期。因此,祁门红茶正是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茶叶贸易格局的大背景下出现的。这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只有从全球视野关注以英国为主导的国际茶叶贸易格局发展的大趋势,才能更深入认识祁门红茶出现时间的合理性。

^① 侯冕:《江西浮梁红茶产销概况》,《贸易月刊》,1942年第2期。

三、晚清祁门红茶的贸易状况

祁门红茶出现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属于中国红茶中出现较晚者,且其诞生时正逢华茶在国际市场受到印度、锡兰和日本等国茶叶冲击的由盛转衰时期,但祁门红茶的销量在短时间后居上,逐渐成为中国红茶的品质标杆并享誉国际。晚清时期是祁门红茶外贸发展的早期阶段,也是理解祁红何以能实现迅速崛起的关键所在。而以往学界对祁门红茶的研究重心大多置于民国,对其早期贸易情况缺少关照。有鉴于此,笔者对晚清时期祁门红茶贸易状况进行论述。

管见所及,目前所见祁门红茶最早出现在汉口茶市是在1878年江汉关的海关报告中。当年在汉口出售祁红37502箱^①,1879年是56009箱^②,1880年为53473箱^③。1880年《申报》记载,祁门、浮梁红茶贩运汉口途中经过景德镇被当地厘卡苛刁,“今春祁浮运茶者至景德镇,该镇素设两卡,上卡景字,下卡德字。……以此留难,存心索费,茶船到卡投票请验,即将引票扣留,串同巡丁,索取规费。小票一卡,需洋三五元,大票需洋十数元,稍不如意,则执票不放。”^④这是目前所见《申报》对祁门红茶贩运的最早记载,可与海关报告比照而观。

众所周知,晚清时期闽红、宁红贸易发展已比较成熟,因此,祁门红茶在外销过程中往往借助宁红声誉,在汉口茶市多以“宁祁”统称。如1884年5月18日,《申报》记载,“现总计到两湖与宁祁等茶,共六百四十五字,两湖二十八万多箱,宁祁等十四万三千多箱。十九日止,沽出宁祁等茶一百八十一字,计八万五千三百多箱”^⑤。直到1909年,汉口茶市中仍以“宁祁”来称宁红和祁红^⑥。民国以后,祁红因品质优异而日渐凸显,而宁红品质却不断下降,此消彼长之下,祁门红茶贸易日趋兴盛,在汉口茶市中亦逐渐以“祁红”称之。由此可知,晚清时期祁门外销曾一度借助了宁红的声誉。

从售价来看,光绪中叶以前,祁门红茶每担市价一直低于宁红。例如,1886年,汉口茶市中,“宁州茶每担价银二十八两至五十一两五钱,祁门茶每担四十两至四十四两”^⑦。到1890年依旧如此,当时海关报告记载,“茶季中最好的茶是祁门茶,质量比宁州茶好很多。但由于俄国人不需要这种茶,所以卖得很便宜,比1889年每担便宜八到十两”^⑧。直到1895年左右,祁门红茶每担售价才超越宁红。1895年汉口茶市中,“祁门茶价在六十两至五十余两;宁州价售六十五两”^⑨。1897年,“宁州茶每担三十八九两至四十八九两,祁门茶四十一两至五十三两”^⑩,祁门红茶售价已超越了宁红。1899年5月16日,汉口茶市中,“宁州茶每担自四十六两至五十两,祁门茶每担自五十八两至六十二两,建德茶每担四十二三

① 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for the year 1878.*, Shanghai: Sta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1879, P73.

② 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for the year 1879.*, Shanghai: Sta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1880, P60.

③ 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Reports on Trade at the Treaty Ports for the year 1880.*, Shanghai: Sta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1881, P76.

④ 《红茶被累缘由茶商公启》,《申报》1880年7月30日,《申报》编写组编:《申报》第17册,第119页。

⑤ 《续报茶信》,《申报》1884年5月18日,《申报》编写组编:《申报》第24册,上海书店,1987年,第777页。

⑥ 《茶业改良议》,《商务官报》第4册,1909年第26期,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年,第495-496页。

⑦ 《汉江茶市》,《申报》1886年5月12日,《申报》编写组编:《申报》第28册,第743-744页。

⑧ 张姗姗:《近代汉口港与其腹地经济关系变迁(1862—1936)》,齐鲁书社,2020年,第84页。

⑨ 《汉皋茶市》,《申报》1895年5月18日,《申报》编写组编:《申报》第50册,第109页。

⑩ 《鄂中茶市》,《申报》1897年5月20日,《申报》编写组编:《申报》第56册,第119页。

两”^①。当年5月25日《申报》记载,“祁门茶每担货银六十两,宁州茶五十二两”^②。1900年5月15日,《申报》记载,“祁门茶每担白银四十五两至五十两,宁州茶自三十七两至四十五两”^③。

进入1901年以后,祁门红茶售价超越宁红幅度更大。1901年5月28日,《申报》记载汉口茶市,“祁门茶顶盘五十六两,其次三十九两,或三十二两五钱;宁州茶顶盘三十二两五钱,其次二十八两五钱,或二十二两五钱”^④。晚清商务大臣盛宣怀也说:“汉口所售红茶价目,以祁门为最,高者四五十两,低者二十两左右;宁州次之,高者三四十两,低者十余两;河口、两湖则又次之,高者三十两,低者十两以内。”^⑤

1909年湖北商务议员孙泰圻调查汉口茶市时,统计了祁红、宁红售价(表1)。

表1 1909年湖北商务议员孙泰圻调查汉口茶市中祁红、宁红售价一览			
时间/茶叶名称	光绪三十一年	光绪三十二年	光绪三十三年
祁门春茶	三十七八两至七十两	二十二三两至五十八九两	十六七两至五十二三两
宁州春茶	三十两至四十两	二十一二两至四十三四两	十六七两至四十三四两

资料来源:《汉口商业情形论略》,《商务官报》第1册,1909年第23期,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年,第451-452页。

从表1可知,光绪末年,汉口茶市中祁门红茶每担售价全面超越宁红。1910年,汉口茶业公所农务科科员陆淦调查茶市时也说:“查汉口茶市,……其价值以安徽之祁门茶为最昂,江西南州茶次之,湖南安化等茶又次之,湖北茶则更次焉。”^⑥上述考察充分说明,1900年以后,在市场竞争力方面,祁红已超越宁红,其优异的品质已得到全面体现。时人对此已有清晰的认识:“华产以祁宁为最,惟培壅、采摘、焙制诸法不如印锡。义宁又不如祁门,遂致年年绌销失败。……若取法祁茶,以麻枯饼等四项为肥料之主,自不难追踪。”^⑦说明在1909年左右,宁红品质已大幅度下降,外销连年亏折,相反,祁门红茶则是培植、制作均佳,品质优异,贸易日盛。祁红售价不断增高,对外贸易日盛,甚至造成一贯以出产绿茶闻名于世的婺源、屯溪等地也改做祁门红茶。光绪十六年(1890),“本届祁门茶额亦增多,因婺源、屯溪向产绿茶,难于沽利,今亦改做红茶也”^⑧。由此可见,祁门红茶在当时是何等畅销。

晚清时期,俄英两国围绕汉口茶市中的头茶展开价格竞赛,造成汉口茶市中头茶价格居高不下^⑨。而祁门红茶因产地的气候条件得天独厚,具有特殊的“祁门香”^⑩,出产的茶叶品质优异,成为颇受洋商喜好的高端红茶。这也是造成1895年以后,祁门红茶在汉口的售价超越原来品质较高的宁红茶的重要原因

① 《茶市初闻》,《申报》1899年5月16日,《申报》编写组编:《申报》第62册,第111页。
② 《茶市先声》,《申报》1899年5月25日,《申报》编写组编:《申报》第62册,181页。
③ 《汉皋茶市》,《申报》1900年5月15日,《申报》编写组编:《申报》第65册,第111页。
④ 《汉皋茶市》,《申报》1901年5月28日,《申报》编写组编:《申报》第68册,第175页。
⑤ 《茶商董事上商务大臣盛宣怀求减茶税稟稿》,《农学报》1901年第16期。
⑥ 《本公所农务科科员陆淦奉委调查两湖祁门宁州茶业情形》,《湖北农会报》1910年第2期。
⑦ 《批奖宁茶改良公司》,《申报》1909年9月9日,《申报》编写组编:《申报》第102册,第120页。
⑧ 《茶市情形》,《申报》1890年5月28日,《申报》编写组编:《申报》第36册,第859页。
⑨ 有关英俄在汉口竞买头茶的内容,参阅张姗姗:《近代汉口港与其腹地经济关系变迁(1862—1936)》,73-79页。
⑩ 关于祁红的独特香气,民国学者有一些具体论述。朱毓乔称:“祁门的红茶,名闻天下,外人素称祁门黑茶……据茶叶专家们说,祁门红茶具有浓厚的香气,和色泽光亮的茶汤,乃是天赋的特点。”(《红茶的制造法》,《农友》1934年第8期。)蒋学楷亦云:“考红茶之品质,以香气为最不易得,故赋有馥郁之天禀香气者,经售高价。祁红之能在世界市场占特殊之地位,即因赋有此悦鼻清香之故。倘缺乏此香气,即与普通红茶无异,其售价亦不能得若是高也。祁红中所以能有馥郁之芳香者,厥有两大要素:一为优良之鲜叶原料,一为熟练之烘茶手法,两者缺一不可。”(《祁门红茶》,《农村合作》1936年第3期。)陈洪彦也说:“祁红之所以能著称于世者,以其具有特殊之香气,非他种红茶所能及者也,市场上有一名词曰‘祁红之香气’,盖指祁红有其特殊馥郁芬芳之香气也。”(《红茶评审》,《贸易月刊》1942年第7-8期合刊。)

素。张姗姗也关注到祁门红茶兴起的原因：“祁门由制作绿茶转变为红茶，可以说也是受到了汉口市场的吸引力，祁门红茶改制的时期，正是汉口红茶出口贸易蓬勃开展的时期，高品质的红茶在汉口非常畅销，处于售价极高、供不应求的局面，同时期的绿茶售价却没有这么高，改制红茶正是应时之举。而祁门地区的茶叶品质特别适合于制作高档红茶，所以能够逐步发展成为重要的红茶生产区。”^①这充分体现出祁门红茶后来居上的自然禀赋。

19世纪六七十年代，祁门红茶出现后，因外销日盛，祁门红茶产区境内很快形成经营红茶的风气。以祁门县为例，祁门境内已是“植茶为大宗，东乡绿茶得利最厚，西乡红茶出产甚丰，皆运售浔、汉、沪港等处”^②。祁门红茶主要集中西乡、南乡，“西南两乡务农者，约占十分之七，士、工、商仅占十分之三，多藉茶为生活，营商远地者，除茶商而外，寥寥无几。”^③

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原先经营绿茶、安茶贸易的商人纷纷转向红茶贸易，并逐步形成家族优势，例如，以陈丽清、陈世英、陈郁斋等红茶商人为代表的祁门西乡桃源陈氏，光绪初年，陈丽清在西乡经营怡丰茶号，研制红茶，开西乡经营红茶风气之先。随着贸易的兴盛，其家族先后在西乡开设13家茶号，并在苏州阊门设有义成茶叶出口公司^④。

祁门茶商十分活跃，以胡元龙^⑤、李训典等为最。在祁门红茶创制初期，南乡李训典所在的景石李氏家族也积极从事红茶、安茶贸易，并成为著名的茶商家族。以往对李训典家族的茶叶贸易了解不多，近日笔者阅读到《祁门景石李氏族谱》《李训典行状》，其中披露了李训典家族的商业经营情况，这对于探讨晚清时期祁门红茶贸易情况具有重要价值。从《祁门景石李氏族谱》和《李训典行状》等资料来看，景石李氏家族从李训典的高祖开始世代经商。至其伯父李教道（1834—1886）中年去世，“家中茶业生理正盛，助理需人”。于是训典遵守“有事弟子服其劳之训”的族规家训，“舍学就商”，佐助父亲和兄长训谟一起经营“经营德隆安茶号、鼎和红茶号”^⑥，从此走上茶叶经营之路。

李训典家族从事安茶和红茶两种茶叶贸易，其过程可谓大起大落，步履维艰。关于安茶，民国旅行家洪素野曾谈及：“红茶以外，尚有少数仿六安茶制法，名为‘安茶’的，在两广一带负盛名，产于南乡。”^⑦由此可见，安茶主要以祁门南乡出产最为著名。李训典就是祁门南乡景石人，因此，其家族从事安茶贸易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李训典开始接手茶叶生意之时，安茶贸易“胜算常操”。然至光绪五年（1879），“红、安两茶，均遭亏折，继开景隆茶号又蒙钜创，元气因此大伤”。但他并未灰心，始终秉承“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厌焉”^⑧的“徽骆驼”精神，继续进行茶叶贸易。光绪十四年（1888），李训典在南乡奇口村开设德和隆茶号，终于“稍获盈余”，家族的商业贸易开始有所好转。

但好景不长，债务危机以及人员更迭又使家族茶叶贸易陷入困境。光绪十七年（1891），李训典将一部分商业利润用于建造新房，花费甚大，新居落成之时，已背负一定债务。此后的茶叶贸易时好时坏，造

① 张姗姗：《近代汉口港与其腹地经济关系变迁（1862—1936）》，第83页。

② [清]刘汝骥：《陶甓公牍》卷十二《法制·祁门民情之习惯·职业趋重之点》，《官箴书集成》第10册，黄山书社，1997年，第601页。

③ 李家骥：《祁门全境乡土地理调查报告》，《安徽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杂志》1914年第4期。

④ 徐海啸：《徽州红茶文化研究——以桃源为例》，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页。

⑤ 关于胡元龙的茶叶经营，可参阅康健：《祁红创始人胡元龙的商业经营及其困境——以新发现的分家书为中心》，《农业考古》2019年第2期。

⑥ 《李训典行状》1册，民国写本。

⑦ 洪素野：《皖南旅行记》，中国旅行社，1944年，第143页。

⑧ 光绪《祁门倪氏族谱》卷下《诒封淑人胡太淑人行状》，光绪二年刻本。

成“前偿未清,新债又起,继长增高”,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得李训典长期背负沉重的思想包袱。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训典陪着父亲经理三公祠,建造享祠,并利用祠堂租设鼎和茶号,兼营杂货、药材生意。当时其兄长训谟去世、父亲又双目失明,加之当年红茶行情虽然尚好,但安茶却严重滞销,造成生意亏折,致使“家计债务,丛集一身,其困窘宴,难以言状”^①。此后,李训典的红茶生意一蹶不振,债台高筑,终身受累。光绪二十八年(1902),李训典又遭丧父之痛,从此家庭负担落在他一人身上,苦苦支撑茶叶贸易。光绪三十三年(1907),李训典母亲去世,他的精神受到沉重打击,对茶叶生意不免灰心,转而潜心研究《茶经》,探寻优良的制茶之法,力求精益求精。

因李训典在祁门红茶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宣统二年(1910),他“被安徽实业厅委为办理南洋劝业会祁门茶叶出品专员,亲赴南京与会”。李训典不辱使命,为祁门红茶赢得很高的声誉,由此获得农工商部的褒奖^②。迨至民国,李训典又相继被委任为办理巴拿马赛会徽属茶叶出品专员、意大利都郎博览会徽属茶叶出品专员,负责组织徽州各地茶叶参与国际展览,为推动徽州茶叶尤其是祁门红茶享誉世界做出重大贡献。“半生苦心孤诣,得此佳果,利虽未就,志稍申矣”^③,可谓对李训典生平所作恰如其分的评价。

晚清时期,祁门从事茶叶贸易的商人众多。如祁门南乡查湾汪履吉在太平天国之后,先在景德镇瓷业店当学徒十多年。光绪二十年(1894)其父汪树森去世后,遂“离职归里,秉承先大父遗志,专营茶务,潜心研究,求改良精制之法,信誉章闻”,转行从事茶叶贸易。光绪二十五年(1899),他先后贩茶于汉口、九江、广州等处,获利颇多,并建造新房屋^④。祁门南乡礼屋康氏家族经营红茶贸易者亦不在少数,尤以康达为代表^⑤;西乡历口汪氏家族经营的“亿同昌”红茶号,经营的规模较大。也正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祁门茶商的接续经营,才使得祁门红茶异军突起,成为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中国茶叶品牌之一。

结 语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动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国际茶叶贸易被操纵在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手中,华茶命运不能自主,其红茶、绿茶市场逐渐被印度、锡兰、日本等国挤占。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红茶贸易为主的国际茶叶市场格局中,祁门红茶应运而生,给衰败中的中国茶叶带来新的希望。以往学界没有从全球视野考察祁门红茶,未能揭示出祁门红茶出现的国际背景,对祁门红茶产区的认识也多局限于祁门一县,缺乏对祁门、建德、浮梁三县的综合考察,由此得出祁门红茶的初创制时间为1875年的片面认识。

笔者从学理上、逻辑上将祁门红茶产区所在三县进行综合考察,通过细致考证,得出祁门红茶并非在1875年突然出现,而是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具体来说,1861年是祁门红茶出现的萌芽时期;同治五年建德出现红茶,为祁门红茶出现的第二阶段;至光绪初年浮梁最晚出现红茶,则是祁门红茶出现的定型时期。换言之,1875年乃是祁门红茶最终形成而非最初出现的时间点。从世界茶叶贸易态势看,1875年是华茶和印度、锡兰、日本等国茶叶在国际市场竞争的一个分水岭^⑥。此后,中国红茶、绿茶的国

①《李训典行状》1册,民国写本。

②2019年8月3日,笔者在祁门南乡景石村考察时,在李训典后人家中发现一块农工商部褒奖他的奖牌。其正反面围有“南洋劝业会、农工商部颁给”字样,中间有“宣统二年褒奖”字样。

③《李训典行状》1册,民国写本。

④《祁门查湾茶商汪履吉哀讣》,民国二十六年写本。

⑤郑志锡:《民族实业家康达》,祁门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祁门文史》第1辑,徽州新华印刷厂,1985年,第1-16页。

⑥林齐模:《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以对英国出口为中心》,《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际市场份额不断被这些国家产出的茶叶所挤占,到1890年以后,中国红茶在英国的传统市场被印度取代。因此,祁门红茶诞生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中,可以说是挑战与机遇并存。

从历史发展情况来看,祁门红茶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后,在九江、汉口等茶市的茶庄数量、外销数量和茶价方面逐渐增长,到20世纪初在价格和品质方面全面超越品质优异的宁红,成为中国红茶品质最优者。正如民国学者吕允福所言:“我国红茶,以祁门所产者为最佳,宁红次之,湖红又欢之,温红品质最下。”^①可以说,历史选择了祁门红茶。晚清祁门红茶享誉海内外,为日益衰败中的华茶在国际市场上赢得荣光。进入民国以后,祁门红茶更是“一枝独秀”,成为支撑华茶贸易残局的象征。

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初以降,尤其是五口通商以后,中国红茶制造技术从福建不断向北扩大到江西、两湖和安徽等地区,推动中国红茶产区迅速扩大,出现宁红、湖红、祁红、温红等。但这些都是西方巨大的茶叶消费需求背景下发生的,红茶技术也仅局限于中国传统的手工技术在空间上的传播,并没有出现真正的近代技术革新。而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英属印度、锡兰红茶和日本绿茶因采用机器大生产迅速崛起,严重冲击中国茶叶原有的国际市场,彻底打破以往华茶垄断国际市场的格局。从此以后,华茶从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外销茶价日跌、数量锐减,日趋衰败。对此,时人已经有清晰的认识。光绪十一年(1885),两江总督曾国荃提出:“目今印度产红茶,日本产绿茶,均多于中国,华茶销数日绌,茶业日见萧条,价值毫无把握。此洋茶日盛,而华茶日衰,内销与外销之势,实难强之使同也。”^②

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祁门红茶正是诞生在这样复杂的国际背景下。祁门红茶虽然品质高端,外销也一度兴盛,但因采用的是传统制造技术,缺乏技术革新,其创制的根本动力也仅是迎合国际市场需求,因此依旧无法扭转华茶外销日趋衰败的局面。以往对中国茶业经济的研究多局限于区域史范畴,对各产茶区及其产品作分别考察,缺乏从全球视野加以审视,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闽红、湖红、宁红、河红、温红等近代中国不同茶区红茶的创制源流、演进轨迹等可能和祁红存在类似的问题。因此,通过本文的考察,笔者认为对近代华茶的研究只有跳出传统的区域史视野,从全球视野的角度来考察中国不同茶区茶业经济和茶商发展演进,才能透过现象揭示出不同茶区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发展的局限性。

(责任编辑:胡文亮)

① 吕允福:《改良红茶发酵器之构造与使用法》,《浙江省第五区农场专刊》,1935年创刊号,第50页。

② 《皖南茶税请免改厘增课全案录》,光绪十一年刻本。